

甲午 影像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编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甲午 影像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影像志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卞修跃编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75-4279-0

I. ①甲… II. ①卞…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摄影集
IV. ①K256.3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6207号

甲午影像志

编 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著: 卞修跃

责任编辑: 李瑞虹

特约编辑: 乔先彪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x1092 1/12

印 张: 25.5

字 数: 40千字

图 片: 251幅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279-0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李宗远

编 著 卞修跃

编委会 卞修跃 李鑫 罗存康 都斌 （按姓氏笔画排序）

目 录

前 言 中日两国近代命运与道路选择 001

第一章 甲午战前的中国与日本 025

第一节 没落的大清王朝 028

第二节 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 042

第三节 中日之战 058

第二章 朝鲜之战 065

第一节 日军仁川登陆 067

第二节 牙山之战 078

第三节 平壤之战 084

第三章 黄海大战 091

第一节 北洋之舰 094

第二节 黄海海战 100

第四章 辽东之战 115

第一节 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 117

第二节 金旅之战 128

第三节 辽东之战 166

第五章 威海卫陷落 173

第一节 日军荣成登陆 175

第二节 日军进攻威海卫 180

第三节 北洋海军覆灭 213

第六章 马关议和 233

第七章 日军强占台湾 247

第一节 日本强割台湾 249

第二节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276

第八章 台湾光复 285

第一节 抗战胜利 287

第二节 台湾光复 302

后 记 309

前言

中日两国近代命运与道路选择

卞修跃

一、相似的窘境，不同的应对

人们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代以前，两国保持了上千年的和平交往，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也可谓源远流长。由于受到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汉文化圈的辐射，日本自古以来有意识地汲取大陆中国的文化精神，学习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文化建设和历史进程，基本上与中国保持着同步或稍显滞后，其国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也与中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只要我们随意翻开两本分别记载中国和日本封建社会历史的书籍，就可以

明白。而当西欧国家冲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机器化大生产，并进而迈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时，日本与中国一样，依然滞留在中世纪时代。

当历史跨入19世纪的时候，东西方国家间的差距愈益拉开。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乃至美洲独立不久的美国，已经走完了近代工业化历程，开始迈向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主义扩张道路，以寻求更大的市场倾销其机器化生产所制造的商品，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 and 财富。当地处资本主义发展中心之外的东亚国家如中国等，还在沾沾陶醉于“中华帝国”时，西方国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商船炮舰已经踏过万顷波涛，开到了自己

的海岸边。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上半叶，几乎同时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国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日本藩幕政府长期实行的“锁国”政策，也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的坚舰利炮打破和洞穿。从鸦片战争开始，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侵略战争，逼迫封建的清王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一步步地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国家权益丧失几尽，民族尊严受到无比损害，人民苦难空前加重。与此同时，日本也遭到了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入侵。可以说，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与日本几乎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与命运，两国国门几乎同时遭到了西方列强坚舰利炮的叩击。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殖民者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

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攫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弹丸之国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代中西方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渐形成，中国国家的主权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迈进探索近代化的艰难道途。

同样地，日本也很快遭到来自美国殖民者的入侵。在世界的西方，从东亚地区和国家步入近代史开始，美国似乎与日本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撕扯不断的因缘，以迄于今日。1845年，美国国会议员普拉特即向其本国政府当局建议，采取必要手段敦促日本早日“开国”。1846年，美国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毕德勒准将到日本，要求与之建交。1849年，美国又派海军准将格林前往日本交涉，都遭到了德川幕府的严词拒

绝。这一时期，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与美国的海外扩张政策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新兴的美国决心以武力强迫日本开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851年，在美国海军当局和国务卿的策动下，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专门拟定一份国书，要求日本开国。次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柏利（1794—1858，英文名为：M. C. Perry，有人译作培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派其再往日本进行交涉。当时美国国务院下达给柏利的指令是，要他就以下三项内容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一、签订有关救护美国海上遇难的美国船员的长期协定；二、日本为美国船只提供补给煤水和粮食的港口和储煤站；三、日本同意为通商而开放一处或数处港口。同时，美国政府还要求柏利向日本政府当局说明：在当前这种国际形势下，日本当局继续采取“锁国”的方针是错误的，而且，美国之图与日本建交，并没有如法国那样的传教意图，与英国在亚洲的活动也没有关系。如果日本仍然不同意开国，美国当局则授权柏利，必要时可以诉诸武力，表示强硬态度。

1852年11月24日，柏利率领一支由旗舰“萨斯克哈纳”号、军舰“密西西比”号及两艘武装轮船“朴里茅斯”号和“萨拉托嘉”号共计四艘船舰组成的舰队，由美国诺福克海军

基地出发，穿过大西洋，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次年4月7日到达香港，然后经上海前往日本，于1853年7月8日驶抵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

柏利所率领的这四艘通体涂得漆黑的武装蒸汽船的来临，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俨然就是海上漂来的庞然大物，而它给日本当时各阶层所造成的震荡也是前所未有的。德川幕府当局惊恐失措，江户城内一片混乱。一切侵略者的典型性格，都是张扬跋扈、蛮横无理的。柏利来到浦贺后，即令舰上士兵全副武装，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他告诉日本地方当局，称自己带来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日本与美国缔结通商条约，放弃其长时间所时持实行的锁国政策。当浦贺行政当局根据惯例令其驶往长崎进行交涉时，柏利不仅不予理睬，反而率领三四百名水兵强行上岸，进行武力威胁，同时蛮横地要求幕府当局派出要员前来接受国书。在这一国书中，美国总统写道：“世界今后将处于必须开国、进行贸易的形势中，日本也应该开国”，力图“开导”日本当局放弃既定国策，与美国建交。

面对美国的汹汹来势，日本幕府当局手足无措，想借故推辞不予谈判，但柏利却一再威胁：“如果这样磨磨蹭蹭，我们就不只是提

出强硬要求和开展炮舰外交，而要真正开战了。”想与入侵者开战以决上下，但胜败之局不战而知。正是推不掉，打不得。结果，幕府当局只得接受美国国书，应允次年对美国所提要求给予答复。7月14日，柏利把国书连同自己写给日本当局的威吓信一起交给了日本官员，然后率舰驶离了日本海岸。临行前，他向日本代表宣称，明年春天，将再来日本听取答复。与此同时，在近代历史上对别国进行侵略从来不甘落后的俄国，对日本的北方岛屿久存覬觐。在柏利扬长而去一个多月后，1853年8月22日，沙皇俄国的海军中将叶夫菲密·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日本长崎，向幕府当局要求开国通商，划定千岛和库页岛的日俄边界。遭到日本政府的婉词拒绝。10月，俄国军队进占库页岛的久春古丹。1854年1月3日，普提雅廷再次来到长崎，逼迫日本与之谈判，并提出了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侵略要求，遭到日本方面的严词拒绝。柏利是新兴美国海军中的一员得力干将，更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扩张分子，一心想为美国打通太平洋航线。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紧步其后尘到日本的交涉，使他感到不安和不满。所以当普提雅廷第一次到日交涉未果时，曾转航中国上海，想与柏利取得联系，以求对日采取共同行

动，当即遭到柏利的拒绝。柏利认为，日本作为美国开辟太平洋航线的理想的中继站，不能容得别国插手，而美国政府在迫使日本开国问题上，尤应以自身的迫切需要为原则，绝不可落后于第三国。所以，1854年年初，他即不顾天寒水冷，迫不及待地由香港起航，再往日本。1854年2月11日，驶抵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这一次，柏利舰队的规模比前次更大，共有七艘军舰，配备有近二百门大炮，上千名水兵。柏利决心以武力为后盾，攻破日本藩幕执意不愿打开的国门。

落后的日本封建藩幕政府再一次面对着西方世界的强大力量。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落后于时代的集团势力和思想观念，在其面对新兴的、客观上与历史发展进程相符合的力量的对抗时，每每显得力不从心，甚而是一败涂地，无可挽回。而这一次日本封建藩幕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力量——这种观念虽然在当时已表现出了它本质的反动性，但它又是与当时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所紧密相连的观念，与东方封建专制主义观念相比较，它却是新兴的，与当时的历史发展脚步合拍的——而且它更须直接地面对这种观念背后的，同时又明显地在轮船的吨位、船上蒸汽机、大炮武器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强大的现实

的物质的力量。这种物质的现实的力量却是进步的，被新的历史时代所创造出来并足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新兴力量，日本封建藩幕所固有的落后观念及其倚为后盾的木炮土墙，远远不能与之对抗。

在柏利的武力威胁下，日本幕府当局屈服了。1854年3月31日，日美双方在神奈川(横浜)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又称《日美神奈川条约》，1855年2月21日，双方在下田换文后正式批准生效。这是日本近代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正文十二条，附录十三条，规定：日本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只可以在这两处港口加煤上水，补充日用必需品；美国人在该两处港口进行贸易时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可以派遣领事驻在下田；美国船只在海上遇难时，日本要给予救护，对遇难人员要积极救护，不得刁难等。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不仅实现了它建立太平洋航线中继站的迫切愿望，同时使日本紧闭近二百年的国门由此洞开。

此后，英、法、俄、荷兰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紧步美国后尘，蜂拥而至，逼迫日本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放了许多处沿海港口，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司法独立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本闭关锁国的时代

一去而不复返。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日本开始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日本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然而，面对着相似的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共同命运，当时的中日两国的统治者集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从而使日本与中国在近代史上开始分别踏上两种不同的道路：当中国封闭长久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舰利炮洞穿之际，当时的中国社会和统治集团甚至对西方世界还处于一无所知之中，对处理近代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准则更是一窍不通，他们死守着传统的“老大帝国”的固有心态，把这些来自于海上的西方殖民者一概视为蛮夷未化之民，在一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些西方的“蛮夷”将会为中国、为中国的社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而一旦他们领教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也只怀着一种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基于一种不动摇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体用之争的纷攘之中，展开了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然而，历史的事实向人们证明了在近代史上，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已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对立，更是一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开始走向没落腐朽的封建主义文明与当

时正处于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在这两种文明、两种时代的冲突中，中国社会遭到连番的挫折与失败，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遭到列强武装侵略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逃不出签约开港、割地赔款的厄运。历史进入19世纪末叶之际，中国在一次次列强侵略战争的打击下，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当中国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欲图以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谋求挽救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时，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则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严重阻碍，并最终摧残了维新变法运动，使近代中国继续在遭侵略、受欺侮的道路上向灾难的深渊沉沦。

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选择了与中国不同的应对之策。美国人柏利武装迫使日本开国，在日本近代史上称为“黑船事件”。这一事件，在当时对日本国内社会各界所产生的震动极其巨大，对其后日本近代史的发展，对日本国家政体、国家道路、国民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正如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于中国近代史具有特殊意义一样，“黑船事件”之于日本近代史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成为扭转日本国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契机，而且

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一重要契机所产生的影响终于冲破了日本海国的国界，波及亚太地区各国，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其严重性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日本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孤悬海上，四面环水，与大陆交通相对隔绝，加以数百年政府当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其整个民族活动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岛国上。与外界没有交流，没有比较，于是也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全局和当时世界潮流，反而逐渐养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甚至发展成一种不切实际的民族自负心理，误认为“普天之下，我为独尊”，日本列岛上所已有的一切，日本民族所将创造的一切，都是世间最好的，最强大的，同时也是最无敌的。然而，忽然有一天，几艘在当时日本人眼中俨然是庞然大物的、配备着先进的蒸汽动力和远射程大炮，吨位是当时日本最大船只十至三十倍的轮船，由太平洋上飘然而至，体现着一种更强大的、更先进的、更无敌的物质的力量，对日本当时的整个统治阶层、思想界、日本国民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震荡和冲击。这种来自于现实的物质和力量的冲击，比那种来自于心理上的、文化上的、观念上的力量的冲击，更直接，更实在，更激烈，几乎足以摧毁日本所固有的那种长时间培

养起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负心理，从而激发日本各界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国民对落后没落的藩幕政治的武器批判。日本为被迫与来犯之敌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感到耻辱，对海上飘来的坚舰利炮感到羡慕，于是，它要重新选择道路，重新选择学习对象，铸造一个新的国家，以与那来自海上的强大力量抗衡。1868年，天皇政府成立，就日本的内政外交军事教育等方面展开了重大改革，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明治维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重又发挥了它那好学的固有传统，在被迫开国的同时，走上了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制度的道路。日本同样也是一个富有创造能力的国家，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日本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了近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打破了传统的落后的封建政治体系，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天皇政体，掌握了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增强了国力，并慢慢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迫，进而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之列。

但是，正是这种极致的发展，不仅使日本即将丧失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负心理重新恢复并逐渐膨胀，而且伴随着近代天皇政体的确立和国家力量发展增强，一个在日后对日本整个国民心理产生极大毒害、对日本国民性造成极度扭曲，并对中华民族造成极端损害，乃至严

重伤害人类正义和世界和平的黑色幽灵——军国主义思想和体制——被确立并得到极度加强，由此，日本踏上了对海外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武装侵略之路，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大日本帝国”成为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一面旗帜，它的范围不再是孤悬海上的日本本土，而是包括它的侵略力量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成为它侵略亚洲各国的口号和理由，在这个“共荣圈”中，日本是君临天下的主人，其他亚太国家都是它的奴仆，是它掠夺财富、张扬“武威”的场所，是它发泄兽性、屠戮虐杀的羔羊。

二、日本“脱亚入欧”，跻身列强

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中国与日本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应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日本作为一个传统的东亚国家，在近代开港之后，一反一千多年间向中国效仿的做法，做出了“脱亚入欧”的策略转变，转而向西方世界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同样

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而随之而来的日本被列强逼迫开放国门，更使日本社会及其统治集团感到严重的威胁。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日本社会重新激起了其好学的民族天性，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海外，对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企图从中寻得摆脱困境的有效良方。1859年3月，日本箱馆“奉行”（当时日本市政的最高行政官员）堀织部正等4人向幕府联名提议向外国派遣使团，这一建议开始引起日本幕府的关注。两年之后，1861年5月，幕府大臣小栗忠顺、冈部长常再次建议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争取与中国政府商讨缔结日中贸易协议。同时，小栗忠顺、冈部长常还特别强调，此次考察中国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因上海当时已成为西洋人在远东的商业、交通和军事据点，通过对这些地方的考察，正可借以了解西洋文明和中国社会的状况。

1862年5月27日，日本幕府派出了由根立助七郎率领的51人使团乘幕府官船“千岁丸”号从长崎出发，前往中国的上海进行考察，这是日本开港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到中国学习考察，使团之中，有后来日本维新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高杉晋作，还有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6月2日“千岁丸”号到达黄浦江，8月1日离开吴淞口，8月8日回到长崎。

当日本使团到达上海时，正值中国太平天国运动高潮之际。通过这次到上海的考察，高杉晋作等人认为，中国原有的帝国风貌已荡然无存，上海势必成为“大英属国”。日本使团还认为，清政府之所以颓败不起，“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既不能造出闯过万里波涛的军舰，也不能造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反使中国志士魏源等人所编译的《海国图志》束之高阁，成为绝版。他们还从中国的处境中霍然自警，认为此番对中国的考察，绝不能成为“隔岸观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日本使团此次上海之行，使日本确立了摒弃“中国拘泥于古法”的做法，增强了其“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的信念，这为日后大规模学习外国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开港之前，日本社会也一直有着向西方学习的传统。在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洋教势力的渗透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锁国令”，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这比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还早实行10多年。不过，日本即便在实行“锁国令”期间，也曾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贸易，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日本幕府还任命一

批官员与种子岛上的荷兰人打交道。这些人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从西欧老牌殖民者荷兰人那里获得了西方文明的知识，即是所谓的“兰学”，而此亦为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兰学”是指在17至19世纪日本人从生活居住在长崎的荷兰人那里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在锁国期间，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培养通晓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从17世纪开始，日本就是通过生活在长崎的荷兰人，大量翻译兰学书籍。到19世纪，日本还在江户设立翻译中心，由那些深谙荷兰语的学者翻译荷兰文著作，介绍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先进科学知识。而日本的许多兰学家在向荷兰人学到“兰学”后，便向日本社会广为传播。1838年，日本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立“适适斋”，专门传播“兰学”，他的徒子徒孙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其中著名的有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和伊藤博文等。

1867年1月30日，日本孝明天皇病故，15岁明治天皇即位。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召开由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制，成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中央政府。德川幕府

起兵反叛。4月，幕府投降，政府军进占江户，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明治天皇政府成立。与此同时，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五条誓文》，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等基本国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仿效西方，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统一货币，并改革农业税。1885年实行内阁制，并于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与政治改革的同时，日本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维新期间，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国内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到20世纪初叶，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成为亚洲当时第一强国，跻身于列强之林。

在明治天皇即位之初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即确立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基本国策。1871年12月，明治政府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一方面试图修改幕府末期以来日本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确立与列国并肩之基础，奠定独立不羁之体制”；另一方面其更重要的目的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

国体，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以及各国军事技术及现代战略战术等。1871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欧美使节团”一行共50余人，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复转向欧洲，途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于1873年5至9月先后回到日本。岩仓使团与欧美等国交涉修约与贸易谈判虽然受到挫折，但使团游历访问了欧美许多国家，拜见各国首脑，考察政府机关、议会、法院、港口、要塞、兵营、农牧场、学校、报社和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实地的考察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已经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日本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访欧美使团长岩仓具视十分感叹地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所以使团成员通过实际考察为日本开出了富国强兵的药方是：富国方面要以英国为榜样，强兵方面要以德国为楷模，以尽快缩短与西方各国的差距。岩仓使团回国后，与使节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

米邦武将把这次欧美考察的实录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该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日本朝野上下通过对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深入了解，最终使日本统治者们提出和制定了脱亚入欧的重要国策。而系统提出脱亚入欧思想，论证脱亚入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则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60年至1867年间，福泽谕吉曾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见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在日本畅销轰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发表了一系列代表作品，倡导日本“脱亚入欧”，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劝学篇》《文明论概论》《脱亚论》等。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更进一步论证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必要性。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日本目前所应“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

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所以，他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然而，其脱亚论的实质内容却更在于，在国富兵强之后，其“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的代表，他的观点和主张对日本近代化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也为日本奠定了“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脱亚入欧的国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对推动日本近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对推动日本社会政治近代化，使明治维新得以顺利而有效地全面进展确立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在“脱亚入欧”思想的引导下，日本很快走向富国强兵之路，迅速崛起为东亚地区的强国。

然而，在日本近代实行“脱亚入欧”国策、实现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其追求富国强兵的努力，与日本社会传统的封建道德精神、皇国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日本近代社会意识形态

的怪胎，即军国主义，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本的指导观念。而在其军国主义形成的过程中，福泽谕吉等思想家所倡导的“脱亚入欧”的思想及其内在实质，也正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及其侵略扩政政策的思想根源，同样也成为日本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思想根源。

福泽谕吉的理论和主张，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在日本近代社会意识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明观上，福泽谕吉著有在日本近代流传极为广泛的《文明论概略》，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当时世界文明之三个阶段的理论，从理论上推崇西方欧美诸国为“文明国家”，把历史上一直作为亚洲文明之象征的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指斥为“半开化文明”，由此奠定了他所极力倡导的日本必须“脱亚入欧”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福泽谕吉更系统地提出了他那对日本近代民族心理形成具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中国观：首先，福泽谕吉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否认日本千百年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在福氏的各种立论中，都把中国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他从孔子、孟子的“不谙世务”，“徒招丧家之犬之辱”，一直谈到自己天生怀疑中医，进而论及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的“不守本分”：“治学的要道